

疏通知译史

邹振环著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疏通知译史 / 邹振环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

ISBN 978-7-208-10829-5

I. ①疏… II. ①邹… III. ①翻译—语言学史—研究—
中国—近代 IV. ①H15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0660 号

责任编辑 毛志辉

封面设计 范昊如

·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 ·

疏通知译史

——中国近代的翻译出版

邹振环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8.5 插页 2 字数 406,000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829-5/K · 1901

定价 50.00 元

总序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汇集的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部分教师的成果，是以主题的形式辑录各教师所发表的专题论文。

历史学系是复旦大学最为悠久的系科之一，1905年复旦公学高等正斋创设伊始，就在文科中开设有历史学几门课程。1925年正式设系，时称史学系。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得到江浙多所大学著名史学家加盟，实力大为增强。在中国史方面，有周予同、谭其骧、陈守实、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杨宽等教授；在世界史方面，有周谷城、王造时、耿淡如、陈仁炳、章巽、田汝康等教授。前辈学者常常言及，那时的历史学系，与中文系一起共同构成复旦文科的“两个超级大国”。此后，历经几代学者的努力开拓和辛勤耕耘，历史学系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并且始终占据复旦文科发展的最前列，用周予同先生的话来说，历史学系的发展就是要“为复旦争取学术地位”。

这其中，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尽管起步稍晚，也得到很好的发展。中国近代史最初只是“中国史”的一部分，1954年中国史划分为中国上古史（主任胡厚宣）、中国中古史（主任谭其骧）、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主任陈守实），至此中国近代史算是在建制上初步成型。1958年中国史方面的上古史、中古史教研室合并为一（主任陈守实），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则发展为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室（主任胡绳武）。到20世纪70年代，又形成包括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和中

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建制,这些都显示中国近代史学科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形。正是通过蔡尚思、胡绳武、金冲及、汪熙、陈绛、陈匡时、黄美真、余子道、沈渭滨、黄苇、杨立强、朱维铮、李华兴、姜义华、刘其奎、赵少荃等学者的努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瞩目,尤其是在思想文化史、中外关系史、汪伪政权史、资产阶级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集体编撰的成果即包括有《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资料简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等。1994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成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1996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成为国内首批五家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这些皆为体现复旦历史学科整体研究实力的标志,内中也包含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贡献。

步入21世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又有长足发展。以该学科为主体成立的“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姜义华任主任,吴景平、章清任副主任),2004年列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中国近代史学科还被列入“国家重点学科”。此外,本学科承担了国家及省部级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多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问世,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数十篇专题研究论文,还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研究集刊》和《近代中国研究专刊》。本学科每年都主办两次以上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使本学科始终站在学术前沿,在海内外的学术影响也进一步扩大。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选录的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为主的部分教师公开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著述。这些著述,大都出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虽由于作者的年龄、阅历、学术视野和价值取向各有不同而各具特色,但都是这些教师在教学科研中开拓挖掘的成果,是多年心血的积累,反映了这些教师的研究足迹和心路历程,也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风貌的一角。通过这些著述,可以把握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研究领域的学术脉络,而且可以以动态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审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过去和现在,进而为将来的学科建设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是以专题论文的

形式组织书系的出版,因此,还有不少教师的论著未能收入其中,有的教师此前已有集辑出版;暂时还没有这样考虑的,则只有留待他日了。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尊重历史,尊重此前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的学术成果,从历史史实和“历史性”的成果中吸取养分,是“创造”未来学术前沿的前提,也是学术发展永恒的宗旨和道理。我们出版这套书系,在借以回顾和总结以往的成绩及不足之时,同时向学界和社会寻求批评,寻求来自更多层面的交流和沟通,以期共同推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在“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组稿及编辑过程中,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付出了不少努力,在此表示真诚的谢意!

是为序。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编委会

2012年3月

自序

“近代”和“翻译出版”是本论文集的两个重要的关键词。“近代”、“现代”和“近世”在汉语世界里一直有些纠缠不清。“近代”和“现代”在英文里都是用“modern”一词来表达的；而古文献中已有的“近世”一词，在英文中常用“early modern period”，一般是用在与现在较近的时代，界定也很含糊。在历史学界，所谓“近代”和“现代”的划分，至今中外史学界分歧很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大学就读时，大陆学者多把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将184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一段历史称为“近代史”，将1919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为“现代史”，将1949年以后的历史称为“当代史”。以这一分期法为基础形成的代表论著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在西方史学研究中，近代、现代、当代的区别似乎并不存在，所谓“modern”一词，往往包括了一段相当长远的时期，从文艺复兴一直到今天，即便要对这一长久的历史时期有所划分的话，也只是用“前现代”（pre-modern）和“后现代”（post-modern）这样的词，并不舍去“现代”一词。英文“modern”一词是与“modernity”（现代性）和“modernization”（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海外史家的一些论著中，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多从西欧开始近代社会的16、17世纪算起。如当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历史的苏联著名学者齐赫文斯基

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科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确定在1644年,理由是满族贵族征服明朝恰好与世界近代史的上限1640年的英国革命相吻合,可以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的框架里去认识。

台湾著名学者郭廷以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现代化的落后,“其症结并不全在百年之内,实远伏于百年以前,特别是百年前的百年”。^{〔1〕}他在晚年完成的《近代中国史纲》,也是以16世纪的欧人东来为起点,而重点是放在鸦片战争后,该书分上、下两册。上册起于16世纪欧人东来,迄于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下册迄于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取得政权。该书的基本线索与大陆史学界叙述的近代史和现代史最为衔接,本人认为这样的处理比较合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实际。记得当年随朱维铮先生读硕士,他非常主张政治史与文化史、学术史的分期,应当有不同的划分法,曾极力主张将16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即晚明到晚清那三百多年间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来研究。^{〔2〕}我的硕士论文将近代西书中译的开端追溯到晚明的徐光启,而不是从林则徐的译书开始,也明显是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3〕}本文集收入的论文大致也是从16世纪下半期开始,至清末民初,重点在晚清。

翻译活动在中国起源很早,《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周王朝翻译活动的记述,最初“翻译”大多是指从事翻译的工作者,或有学者将之界定为近现代的一个新词,^{〔4〕}实为大误。中国古代有近3000年不间断的翻译活动,因而形成了深厚的翻译传统,也留下了数量巨大、内

〔1〕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参见氏著《中国近代化的延误》,罗荣渠等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3页。

〔2〕 参见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硕士论文《晚清西书中译与文化界》是我1985年在朱维铮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后经修改,以《晚清西书中译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为题,全文连载于叶再生主编的《出版史研究》第2、3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1995年;又收入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07—163页。由于该文与本文集中所收多篇论文内容有重复,故不收录。

〔4〕 黄河清编著,姚德怀审定《近现代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204页。

容极为丰富的翻译文献,但将这一翻译活动的演变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进行考察,却出现得相当晚。大约在20世纪初才有一些系统研究的追求,如1902年的《中外日报》上刊登有佚名的《译书略论》一文,在这篇近3000字的文章中,第一次把明末至清末的翻译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并标明了每个时期所处的时代、所译之书、译书之人、译书之地、译书之宗旨、译书之经费,并简要地分析了每个时期的译书特点。20世纪的20年代,开始有学者尝试以现代的眼光研究和整理中国翻译史,如1920年梁启超在撰写《中国佛教史》的同时,先后写下了《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后者以《中国古代的翻译事业》为题,发表于1921年7月17日《改造》第三卷第11号。1924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郑振铎《林琴南先生》和1925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贺麟《严复的翻译》两文,对两位近世翻译史上的巨擘进行了研究,拉开了近代翻译史研究的序幕。贺麟曾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就是编写一部《翻译西籍小史》,分五章:一、绪论,二、翻译西籍发轫时期——明末清初之翻译,三、翻译西籍复兴时期——江南制造局及同文馆之翻译,三、林纾严复时期之翻译,四、新闻化运动以来之翻译。1925年第22卷第21期刊载的他的博士论文《严复的翻译》仅仅是该书的一部分,可惜全书未能完成。1938年阿英有志于以章回体形式来编纂近代中国的《翻译史话》,第一回“普希金初临中土、高尔基远涉重洋”,第二回“莱芒托夫一显身手、托尔斯泰两试新装”,第三回“虚无党美人款款西去、黑衣教士施施东来”,第四回“吟边燕语奇情传海外,蛮陬花劫艳事说冰洲”,可惜仅仅写了四回便没有了下文。1941年他完成的《初期的翻译杂志》可能也是他翻译史计划的一部分。^{〔1〕}1944年《说文月刊》第四卷刊有郑鹤声撰写的《八十年来官办编译事业之检讨》。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大陆的学术研究进入低潮,但是海外仍有研究出现,代表性的研究有美国钱存训的硕士论文《近代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后发表于《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1954年5月第14卷第3期,该文应用计量目录学的方法,对16—20世纪40

〔1〕 参见阿英《小说四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20—246页。

年代的中国翻译史进行了综合研究,指出近代各个时期译书的来源、类别、性质和数量,反映出当时译书活动的动机和知识者的思想动向。⁽¹⁾ 1966年韩迪厚完成的硕士论文《严复林纾傅东华翻译检讨》,后以《近代翻译史话》为题于1969年由香港辰冲图书公司出版。该书第一章为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概观,第二章严复及其翻译理论,第三章林纾及其译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第四章傅东华及其同时代的译作者,第五章为结语,谈了作者对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的看法以及对今后研究的展望。整个研究似乎比较浅显,但确实代表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水平。大陆地区的第一部翻译史著作是1984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推出的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该书的问世首次将中国翻译的两个传统,即佛典翻译和西学翻译连在一起,填补了中国翻译史研究体系上的空白。从1984年起至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著作堪称蔚为大观,不胜枚举。⁽²⁾

翻译研究涉及多种学科,具有综合性特点,它不仅要研究翻译的本体,如翻译的性质、作用、标准、理论、技巧与方法;口译、笔译、同声传译、机器翻译等不同的形式;直译、意译、音译、编译、重译、豪杰译等不同译论与译法;形似、意似和神似等不同风格,也有关于翻译与社会、翻译与政治、翻译与文化关系的研究。翻译史同样也可以由多种方式来切入,如通史类的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也可以是断代史,如明代翻译史、清代翻译史;可以是区域性的研究,如买提尼牙孜主编的《西域

(1) 该文由戴文伯中译,首刊于《明报月刊》第8卷(1974年)第9期,后载《文献》1986年第2期,收入钱存训《东西文化交流论丛》,商务印书馆,2009年。

(2) 详细的书目可参见文军、穆雷主编的《中国翻译理论著作概要(1902—2007)》,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该书收录1949年以后的著作较为全面,而1949年前的著作失收甚多。该书1949年前列出的翻译理论著作仅商务印书馆版李文彬的《华英翻译金针》一种,而仅商务印书馆一家失收的就有商务印书馆1904年前出版的颜惠庆著《华英翻译捷诀》、1907年出版的吴嘉善编著的《翻译小补》,以及《英法尺牍译要》等。目录类失收就更多了,仅《东西学书目》、《译书经眼录》和《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三种。据笔者眼界所及,清末就有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1896年)、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大同译书局,1898年)、黄庆澄的《中西普通书目表》(上海算学报馆,1898年)、赵惟熙的《西学书目答问》(1901年)、沈兆祜的《新学书目提要》(上海通雅书局,1903年)、陈洙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1909年)等,民国时期失收就更多了,如周昌寿的《译刊科学书籍考略》(载《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有抽印本单行)介绍了明末清初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译著132种,清末的译书468种,涉及天文地理、数学理化、地理测绘等多种学科。参见收入本文集的《西学汉译文献与中国翻译史研究》一篇。

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笔者也写过《江苏翻译出版史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也可以是译家为中心的,如韩迪厚以严复、林纾、傅东华三位译家为中心的《近代翻译史话》;也可以译作为中心来叙述,如拙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此外,还可以进行专题翻译史的探索:从翻译理论角度切入,如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文学翻译史,如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科学翻译史,如黎难秋的《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其他,如从社会史的角度切入的翻译史研究,突出的代表是钱存训的《近代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历史上翻译与出版关系的研究,同样是翻译外部史研究的重要方面。“翻译出版”作为一个整词何时出现,目前尚未完全厘清。较早将“翻译出版”作为一个学科来认识的,据笔者所知是长期从事文学翻译出版活动的译林出版社的李景端。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先后写过《翻译出版学刍议》和《翻译出版学初探》,指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翻译出版是文字翻译成果的延续和传播,是一种文字转换成另一种或多种文字之后,在传播面上的进一步扩散。可见,翻译与出版两者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并呼吁建立一门翻译出版学,认为这一学科的任务是:阐明翻译出版体系的基本原理和历史演变;揭示翻译出版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及其在不同状态下的特殊规律;研究和调整翻译出版全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制约因素。^{〔1〕}遗憾的是,这一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的重要概念,没有引起翻译界的足够重视,1997年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在以“翻译”起头的90多个词条中竟然没有“翻译出版”的条目,而有些根本不成词条的“词目”,却写入了这部建国以来最大的翻译百科全书。8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间,尽管关于翻译学的理论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迄今

〔1〕 李景端《翻译出版学初探》,该文是作者1987年12月在香港“当代翻译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后载《出版工作》1988年第6期。

为止,尚无一本专著以此为专门研究对象。关于“翻译出版”,笔者先后在1998年和2000年分别完成了《江苏翻译出版史略》(江苏人民出版社)和《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社),两书大致能够反映我上一个世纪关于区域性中国翻译出版史研究的一些想法。

本文集收录的是关于16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近代翻译出版史的28篇论文,分为“译史通述”、“译局专论”、“译家译著”、“译史或问”四编,反映了我近二十多年来有关中国翻译出版史研究的方方面面。

第一编“译史通述”收录了8篇论文,“通述”一词表示该辑论文主要在“述学”的层面上,论文多追求将翻译出版史的史实描述清楚,尽可能将描述接近准确和客观。开篇的《晚明至晚清的翻译:内部史与外部史》,是我2009年应约在“阅读中国翻译史”暑期班和2010年在台湾政治大学所作演讲的整理稿,该文反映了我最近这些年对这一问题的一些思考。留校后曾给本科生开设过“中国翻译史”的选修课,尽管选修的同学甚少,但串讲了一遍中国翻译史却使我有了一路写下去勇气,当时曾发愿来完成一部明清以来的中国近世翻译出版史。本编收入一组均属通述性论文,包括近期完成的演讲稿《西学汉译文献与中国翻译史研究》,都是围绕这一主旨而展开的写作。尽管有些论文至今看来都显得非常稚嫩,鄙意以为对于初涉翻译出版史的学习者,仍有作为入门文献导引的意义。正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深感由个人来完成一部中国近世翻译出版史,实在勉为其难;且研究的面拓展得过宽,很难将研究推向纵深发展,这也是目前一些通述性中国翻译史的缺陷。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后来自己将翻译出版的研究聚焦到地理学译著和历史学译著这两大块。^{〔1〕}

〔1〕 关于本人地理学译著和历史学译著的专门研究,可参见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第二编“译局专论”。所谓“译局”主要泛指近代中国的翻译出版机构。翻译出版机构的研究,在目前中国翻译出版史的研究中,是较为薄弱的环节。而译局的研究却又是翻译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翻译史是一种边缘的研究,在目前参与的研究群体中学术背景各个不同,有来自外语系的,有来自中文系比较文学的,也有来自历史学、法学、经济学和科学史专业的。考察历史上的原本与译本,外语系出身的研究者有天然的优势;考察历史上译本中出现的人物形象等,中文系比较文学的易有深入的阐述,而研究法学词汇术语,则法学专业的学者有自己的优势;而对出版机构的资料进行细致入微的发掘,应是历史系出身的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年我切入中国近代翻译史研究的角度,多集中在近代的翻译出版机构。选入本编的6篇,《墨海书馆〈几何原本〉的续译与上海新知识运动》,属于近期的新作。《京师同文馆及其译书简述》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科技的引进》是20世纪80年代发表在上海《出版史料》上的论文,也是学界从翻译出版史角度最早关于这两个译局研究的学术论文。《土山湾印书馆与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发展》、《大同译书局及其刊行的史学译著》、《创办初期的商务印书馆与〈华英初阶〉及〈华英进阶〉》,都是笔者最近两年间完成的新作。这些论文抽样反映了近代中国译局的官方、教会和民营三个重要的系统。

第三编“译家译著”选入文集的有9篇。《克虏伯火炮与克虏伯火炮书的翻译》虽然篇幅不长,却是学界关于这一论题最早的开掘。《黄胜及其〈火器略说〉》、《辛亥前杨荫杭著译活动述略》、《丁福保与“丁氏医学丛书”》、《冯承钧及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贡献》、《张元济与共学社》、《赛珍珠作品最早的译评者伍蠡甫》、《巴人翻译述论》等论文,都是属于新材料的开掘、整理和考订,虽然其中若干论文距今已一二十年了,但当时均属用心之作。可以告慰自己的是:其间不少论点当时曾被论著文集转摘转载,其间不少考证,至今读来尚能成立,或仍具新意,如《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严复与伍光建》一文中所提出的一些看法,被论者列为“各种新说”的

疏
通
知
译
史

一家之见。^{〔1〕}

第四编“译林或问”收入一组5篇论文。“或问”是古人针对疑难的提问或设问,笔者借助该词表示这组论文主要是通过基本材料的研读,所引出的一系列有意义的问题。史学研究述说除要求准确性之外,还需要有深度的分析和自己的问题意识。本编选入的论文多力图在对史料抉隐发微解读的基础上,阐释问题意识。研究翻译史无法全然绕开译名和术语,因其直接关系到翻译的文化价值观,《〈瀛环志略〉译名试评》是笔者尝试通过《瀛环志略》一书中的译名来讨论徐继畲的文化选择。中国近代百科全书的编译开始于何时,学界看法不一,《近代最早百科全书的编译与清末文献中的狄德罗》通过资料的考辨,指出中国近代最早的百科全书的编译工作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而《大英百科全书》的部分单篇长文译刊于19世纪70年代,19世纪末的中国学者通过日本引进了“百科全书”这一整词,并组织编译了中国的第一套《普通百科全书》。目前关于中国近代百科全书的研究,在海内外学界已渐成热点,该文留下了我最早在此方面探索的印记。医学史研究在目前新文化史中也已成为新秀竞出的领域,收入本编的《西医译著与近代中医界的反省》,是笔者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完成的关于西医东渐问题的探索,该文关于近代西医译述和中医界如何反省自身的若干思考,至今似乎仍有其学说史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我有好几年应邀参与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的研究课题,所主持的“明清以来中韩文化关系研究”,曾留下了一批论文,《清末亡国史“编译热”与梁启超的朝鲜亡国史研究》是其中的一篇,该文就清末亡国史翻译高潮的形成与梁启超关于亡国史研究的逻辑关系,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关于清末亡国史研究的体系,笔者认为是值得进一步展开研究的领域。一位在西方被认为是三流的通俗作家的哈葛德,为什么在近代中国译界中却成为炙手可热的小说家,原因何在?笔者通过对林译哈葛德小说的分析来研究接受环境对翻译原本选择的影响,尝试解答这一谜团。

从译家、译著、译局等具体个案入手,研究某一时期翻译出版与文

〔1〕 参见沈苏儒《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60、82、119页。

化的复杂关系,梳理和整合中国近代翻译出版的流变脉络,并进而提出翻译史上相关问题的思考,是我研究的基本方法。上述四编大概反映了这种研究思考的路向。史学是研究一定空间中时间流逝演变的贯通之学,史料与史观是史学的两翼,没有史料,史学就成了无源之水;而没有史观,史学则成了失去了内在意义的孤家考证。史料强调的是“证”,而史观重视的是“疏”。历史学的迷人之处就在于能够通过抉隐发微,来揭示一系列似乎孤立事件之间的互相联系,进而获取其深层的特别意义。

本文集书名中的“疏通”有着多重的意义。《汉书·孟喜传》有“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¹⁾这是“条理分辨”之意。《礼记·经解》称“疏通知远,《书》教也”,⁽²⁾这是“通达”之意;《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疏通而知事”,⁽³⁾亦即此意。为学以来,对“大而不当”的史观研究不感兴趣,所作研究多为具体问题的“条理分辨”,若干总体的“疏通”阐述,也都是建立在具体问题条理分辨的基础上,这几乎是收入本文集论文的主要特点。当然,由史实构成的历史世界,又是一个具有意义和价值的世界,“条理分辨”并非考辨史学的止境,笔者也在努力借鉴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诸多新方法,以当下的眼光来“疏通”近代中国翻译出版发展过程中事实之间的互相联系,揭示史料与史观之间的关联,从而阐明这些历史事实的意义和价值。这是笔者所谓“疏通知译史”之精神所在。

文集中收入的论文,都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在正式的刊物或论文集上面世过。收入的单篇论文所据资料,尽己所能重新进行了核对,除了个别字词和材料的讹误外,观点和材料均一仍其旧。凡该篇内容和材料有所增改,均在该文附记中加以说明。由于各篇刊载的杂志或集刊要求不一,因此,原篇若干分节未列标题处,本次收入文集时均补列适

(1) 班固等《汉书·儒林传》,《二十五史》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第697页。

(2) 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下),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第1609页。

(3)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二十五史》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第7页。

当的标题;原篇的注释或繁或简,或夹注、或脚注、或尾注、或多注合并,收录文集时均统一为脚注;原文的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按照论文集的统一格式一律删除;对以往注释中的版本等缺漏,按照目前的要求加以补正,以方便阅读。由于各篇分别撰写,写作前后持续近二十多年,所以先后完成的论文各篇之间内容不免重复,或引用资料版本未尽一律;论文集所据电子版原文件,或与正式面世的论文在字句上略有差异,尚祈读者鉴谅。

目 录

第一编 译史通述

晚明至晚清的翻译：内部史与外部史

明清之际的西书中译及其文化意义

送药、求方、窃火：近代西方学术之译述

晚清留日学生与日文西书的汉译活动

民国初期东西译书简论

西书中译史的名著时代在上海形成的原因及其文化意义

抗战时期的翻译与战时文化

西学汉译文献与中国翻译史研究

第二编 译局专论

墨海书馆《几何原本》的续译与上海新知识运动

京师同文馆及其译书简述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科技的引进

土山湾印书馆与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发展

大同译书局及其刊行的史学译著

创办初期的商务印书馆与《华英初阶》及《华英进阶》

第三编 译家译著

克虏伯火炮和克虏伯炮书的翻译

黄胜及其《火器略说》

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严复与伍光建

辛亥前杨荫杭著译活动述略

丁福保与“丁氏医学丛书”

冯承钧及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贡献

张元济与共学社

赛珍珠作品最早的译评者伍蠡甫

巴人翻译述论

第四编 译林或问

《瀛环志略》译名试评

近代最早百科全书的编译与清末文献中的狄德罗

西医译著与近代中医界的反省

清末亡国史“编译热”与梁启超的朝鲜亡国史研究

接受环境对翻译原本选择的影响——林译哈葛德小说的一个
分析

跋